

ZHONG GUO GONG TING WEN HUA CONG SHU



张世祥
彭治荣

DI HOU YU TAI JIAN

帝后 与大监



出版社



中国宫廷文化丛书

中国宫廷文化丛书

帝后与太监

张世祥 彭治荣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柯彦

封面设计:世良

责任印制:金文

帝后与太监

张世祥 彭治荣 著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 13.5 印张 28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81001-757-8

K-97 定价:8.60 元

前 言

对于太监，古之史家多讳莫如深。因此尽管太监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如此之大，但见之于正史的太监事大多一笔带过。惟野史叙之甚详，然国人以为野史乃好事者为猎奇而作，对之多持半信半疑态度。故关于太监的知识，众人或模糊不清，或不以为然。

近年来，对历史的反思之风颇盛，野史因此而被格外重视了起来，有关于太监的著作纷纷面世，大家对于太监的认识亦日益清楚。然笔者遍翻群书，发现大多是以编年体形式来写的，这种体裁虽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但流水帐的色彩太浓，读之印象不深。

基于此，本书编者乃另辟蹊径，将太监的历史与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分成若干专题，逐一述论。这样的编排是为了满足不同兴趣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增加整体性的效果，或通览或阅其若干，均能获益不少。此为笔者之初衷。

本书由张世祥、彭治荣主编，戚明钧、田运胜参与了本书的框架设计，参加撰写的还有施卫忠、江国胜、田金萍、解瑞青等。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不散的阴魂	(1)
末代皇帝的最后“青睞”	(2)
黎明前后的“公公”们	(5)
老太监座谈会	(8)
第一章 为“天国”而“自阉”	(17)
官刑之始	(18)
蚕室酷狱	(24)
自宫的诱惑	(32)
高高升起的“宝贝”	(44)
第二章 帝制大厦中的“尤物”	(48)
官中阴阳人	(49)
帝后掌上玩物	(57)
苦海无边	(62)
历代内侍编制概述	(68)
第三章 龙床的守护神	(81)
敬事房的“守护神”	(81)
进药与外壁	(88)

皇帝的玩伴·····	(101)
第四章 萧墙内的悲歌·····	(107)
无聊的游戏·····	(108)
深宫锁春怨·····	(117)
第五章 红杏出墙·····	(128)
斩草不除根·····	(128)
给嫔妃当“男人”·····	(132)
给嫔妃拉皮条·····	(136)
狼狈为奸的太监太后·····	(139)
宦寺宣淫与嫖妓·····	(149)
第六章 大红灯笼高高挂·····	(154)
“对食”与“菜户”·····	(155)
御制婚姻·····	(158)
吃人的宴席·····	(172)
父少子长的人群·····	(176)
第七章 权力塔尖上的奴仆·····	(186)
皇帝的秘密警察·····	(187)
朝里心腹·····	(193)
权力驱使下的“鹰犬”·····	(205)
大树底下好乘凉·····	(214)
第八章 权力漩涡中的“不倒翁”·····	(219)
求生之术·····	(220)
仕途有捷径·····	(225)
弄权于多事之秋·····	(232)
客为“宠”己者悦·····	(238)
第九章 乱世出“奸雄”·····	(248)

太监外戚沆瀣一气·····	(248)
党锢之祸·····	(255)
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262)
弑主立君的家奴·····	(269)
第十章 贪婪的水蛭·····	(280)
官中“款爷”·····	(281)
不尽财源滚滚来·····	(283)
封母猎艳的荒淫生活·····	(297)
欲壑难填·····	(307)
第十一章 腐物堆中的珠玑·····	(313)
奠定新朝的先锋·····	(314)
“出淤泥而不染”·····	(323)
文明的使者·····	(329)
一代“英宦”寇连材·····	(337)
历史见证人·····	(345)
第十二章 不可逃脱的厄难之命·····	(356)
在劫难逃·····	(357)
刑余者的黄昏与流落为丐·····	(363)
走向深深寺院·····	(370)

引言 不散的阴魂

中国人在人类史有两大“发明”，一曰女子“缠足”，二曰阉男子而作“太监”。“缠足”是国人之独创，自不待言，而“太监”却并非中国之独创，古代西亚细亚诸国，及稍后时代的希腊、罗马都曾役使过宦官，至今英语中仍保留着 eunuch（宦官）一词。然则作为一种制度，它在中国产生之早、组织之严、存在之久，影响之大，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时至武昌炮响，辛亥民主革命之起，清廷分崩瓦解之时，溥仪沦落为伪满洲国君之际，太监仍在中国“兢兢业业”地站好最后一班岗……。

末代皇帝的最后“青睐”

1908年光绪驾崩，宣统皇帝即溥仪即位，其时紫禁城中有宫监机构共63处，太监1900多人。溥仪3岁时即位，可以说他是在太监群中长大的。因此溥仪对于太监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他曾回忆说：“讲我的幼年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侍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左右。他们是我幼年时的玩伴，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由此可见，太监对于溥仪的影响是何等之重要。

辛亥革命后，清廷的统治被革命势力推翻了。但南京临时政府就处置清帝和皇室的问题上制定了“优待条例”。依据《优待清室条例》紫禁城再也不能招收宦官，但仍允许他们住在皇城之中，原有的侍卫人员也一律留用。所以除逃亡的宦官之外，宫内仍保留了1000多名太监。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宣统皇帝依然过着“小朝廷”的优哉生活。溥仪仍然受一批大小廷臣和太监的拥戴。但是，紫禁城表面上的一片平静却再也掩盖不住已经失去平衡的秩序。打从溥仪登基起，宫里就不时传闻盗窃案件、无名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

于烟、赌、诈、骗，更是习以为常，而这些事件的主角就是太监。到溥仪 15 岁结婚大典之时，窃盗更已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这是 1923 年，6 月 27 日。

是晚，溥仪在建福宫看电影，当他刚看完电影离去之时，在建福宫附近突然烧起了一把大火。据《北平日报》1923 年 6 月 28 日记载：“溥仪住所与发火处只一墙之隔。当火头飘发之时，瑾、瑜两太妃及各宫眷等均立殿外，状颇张皇。事后由绍英报告，计焚去建和宫，计九间。鸾仪亭，计东西配殿九间。德日新，计七间。延春阁，计大小七十二间。广盛楼，计七间。静宜轩，计七间。东西廊子，各七间。门楼一座。中正殿后佛楼计十间。中正殿，计五间。香云阁，计东西殿各五间。宝华殿，后檐烧毁，前檐未动，以上各处共焚去一百三十间。”同时，在这场大火中还损失了不计其数的皇宫珍藏。面对如此巨大之损失，溥仪不由得瞠目结舌，但使他更为胆颤心惊的是：这场火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烧死。联想到这几年来宫里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案事，溥仪顿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他认为主要来自于跟自己形影不离的太监。于是他力排众议，执意要尽遣宫中的宦官，传下旨意：宫内只许留下 170 多名太监，在两位太妃等处伺候，其余 900 多名太监无论长幼，尽数出宫！

但是，自幼由太监服侍大的溥仪离开了太监简直寸步难行，虽说他当时遣散太监的举动并非出于一时的激愤而自有其合理的依据，但他毕竟是个离不了太

监的“皇上”，于是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召回了一些过去为他所宠信的太监，以继续他的“皇帝”生涯。

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与冯玉祥拉开了一场“中原逐鹿之战”。当时吴佩孚是直系总司令，冯玉祥是直系前线总指挥。孰料冯玉祥临战之际突然倒戈，回师京城，囚“大总统”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溥仪于其父摄政王府。是年11月，溥仪带着贴身太监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旧日的“宣统逊帝”在“共荣”的旗帜裹挟下，再次在新京“登基”，摇身一变为日本人卵翼之下的“康德皇帝”。当年清王朝崩溃之时，宫中太监多流落于北京各个角落，有许多已被遣返回乡。当时北京北长街的兴隆寺是太监集中的栖身之所。溥仪在“满洲国”“登基”之后，立即派老太监王士清召“公公”去伺候“皇上”，那些忠于溥仪的太监不禁为之心动，时时伺机投奔“满洲国”，以图重当帝宫太监。

然而，“满洲国”毕竟不是“大清帝国”，满洲国帝宫也不是紫禁城，无论从哪方面相比，溥仪的这个傀儡皇帝永远赶不上宣统时的风光了。这一点是那帮不远万里跟随主子的太监们始料不及的。由于时势的急剧变化，溥仪由受人顶膜礼拜的万尊之位跌落于处处受人掣肘的傀儡，再加皇后婉容与外人有染而身怀六甲，以及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溥仪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打太监，令那些忠实于他的老奴仆们非常失望。但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有了好转，这或许是溥仪潜心佛学禅宗的缘故吧。溥仪对待太监还算是不错的，比如晚清太监孙耀庭在“满洲国”帝宫处处受

到溥仪的照顾，他生了肺病，溥仪便将他送到日本医院去治疗。遍翻史籍，一个“主子”对太监仁慈至斯是绝无仅有的。

时光流逝，世事沧桑。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终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溥仪成了一名战犯，昔日的帝皇今日作了人民的阶下囚。树倒而猢猻散，随着帝制在中国的彻底崩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000多年的宦官制度终于轰然而倒塌了。

但是，宦官制度的分崩瓦解并不意味着太监们也随之迅速消失，那些跨世纪的历史见证人，仍然在这个尘世上踽踽独行……

黎明前后的“公公”们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进驻北平。幽灵似的太监散落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一些达官贵人为了“摆谱儿”，雇佣了一些居无定所的“公公”，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民主时代”，这些旧时的太监竟又重温起“黄门梦”来，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之一大奇观。

北京西郊蓝靛厂有一个立马关帝庙，是当年大太监刘承印耗巨资兴建的。刘承印因惹怒了慈禧而被发配黑龙江，但他与李莲英私交甚密，因此李莲英保了

他一本，方使他能在颐和园旁的一个小关帝庙落下了脚，他以巨资对关帝庙进行了改造，重塑立马关帝像，使立马关帝庙成了京西香火最旺的寺庙之一。后来刘承印被赦免回京，立马关帝庙便成了太监们的立身之所。1948年12月份，平津战役打响了，一批批的解放军陆续聚集到蓝靛厂。由于立马关帝庙的地产颇多，所以有一些部队就驻扎在立马关帝庙，庙里储存的大量粮食也无偿支援了解放军，20多个太监也是人人动手做贴饼子、蒸窝头，支援子弟兵。次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是年年底，庙里驻扎了一个解放军土改工作队，所有的庙产被分，太监们个个都成了地主。城里的兴隆寺等太监的遭遇也大抵如此。一个昔年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为人所鄙弃的太监一夜之间竟都成了“地主”！

……

斗转星移，庙产全部归了公，西郊的黑山护国寺收归国有，变成了八宝山火葬场，琉璃河的岫云观、海淀的立马关帝庙、鼓楼前边的宏恩观、南长街的佛堂庙的太监们纷纷迁到了兴隆寺，甚至连前门外博济庵的五六个坤道徒（即女道徒）也迈进了兴隆寺的门槛。兴隆寺一度成了京城佛、道两家的收容所。太监则成了兴隆寺的主持。

在庙内，太监彼此之间，也时而发生激烈的冲突。太监因长期在宫中当差，要是稍微缺少点心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引祸上身，故而太监的心计智谋是非常人能比的，这些太监整天住在一块，可以想象会有

多少勾心斗角。太监们竭尽过河拆桥、诬陷诽谤、搬弄是非、自我标榜之能事，人人大显“神通”，把以前在宫中的那套全用上了。当这些只适合在背后使的“暗招”用完之后，就会爆发出激烈的当面冲突，大打出手，寺中殴斗纷争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寺中主持和上级主管部门手忙脚乱，往往顾此而失彼。

当然，也有的太监十分安分守纪，这主要是指那些有点文化上了年纪的，而过去又是颇有身份的太监，他们往往能在十分空闲的时间，静下心来写一些回忆录、清宫逸事。如当年的司房首领，太监秀才信修明就写了整整四大本的《清宫轶闻录》，后来因故没有及时出版。孙耀庭因跟随溥仪多年，还帮他修改了《我的前半生》，并加上了“太监”一节，这些无疑是福泽后人、功不可没的贡献。

历史的车轮又沉重地向前滚动了几圈，转眼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太监作为清皇廷的“遗老”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兴隆寺、广化寺以及其它一些寺庙自是在劫难逃。寺庙被砸，太监们为自己准备的“寿棺”也被付之一炬。所有的太监都被打成“黑五类”，整天挨批挨斗，有的则被遣返回乡进行“劳动改造”。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太监们遭受了比常人更为严酷的打击，有的太监甚至为人活活整死，这是太监们的悲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文革”后，中国又逐步恢复了秩序，在“文革”

中幸存下来的太监大部分又回到了寺庙，在那里潜心佛学、著书立说，颐养天年，他们中也许有人至今仍健在，过着与世无争的僧侣生活。

老太监座谈会

1964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为征集晚清史料，曾邀集流落在北京附近的老太监举行一次座谈会，到会者有15人之多，有孙耀庭、马德清、任福田、池焕卿、赵荣升、张修德、魏子卿、边法长、戴寿臣，王悦激、刘子杰、孙尚贤、刘兴桥、田璧臣等，每人均有发言。下面是他们的发言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我们为什么当太监

马德清：我是天津南青县窑子口人。父亲是个卖膏药的，母亲是穷人家的女儿。拿“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上顿没下顿”这句话来形容我的家，也就够了。那时候，穷人恨有钱的，有时也羡慕有钱的。比如我父亲，他骂地主“吃人饭，拉狗屎”，可他也厌烦那难以养家糊口的卖膏药的营生。怎么办呢？一家数口总得有条谋生之路呀！

任福田：那年头，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沧州、任丘、河间、南皮、涿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

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

马德清：当太监真正“出息”了的，一千个里难挑一个，可人总是往“亮”处看啊！我有个姑母，她有个远方侄儿叫李玉廷。李玉廷的父亲也是穷人，可是自从李玉廷当上太监，十几年以后，这一家便发了，买了地，拴上了几头大骡子。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下狠心也让我走李玉廷那条路。

孙耀庭：我也讲一讲我为什么当太监的吧！我出身于静海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一家6口，父亲和4个兄弟，我是老二。我出生时，合家只有7分地，两间土房。父亲为同村一个私塾教师种地，母亲为他家做饭，我在他家免费读了4年书。后来父母没地种了，迫于生计，就想把我送去当太监。不久溥仪皇帝下了“退位诏书”，才堵塞了父母送我当太监这条路。几年后，军阀袁世凯又演了一场称帝的丑剧，虽说没多久便散了场，可封建主义那阴魂总不肯消散，溥仪居然不顾民国禁令，重新在民间征太监、招婢女。我父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辗转托人，把我送进宫里当太监的。

池焕卿：除了穷苦人被生活所迫送孩子进宫当太监之外，太监的来路还有几条：歹人拐骗人家的小孩图得一笔身价，这是一条；专门包办施行“阉割”手术的人家，诱骗苦寒人，把当太监的好处说得无花乱坠，鼓励他们把孩子送进宫里去，这是一条；有的人

犯了罪，用“净身”来逃避刑罪，这又是一条。千条万条，被送上这条断子绝孙的绝路上的，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

二、“净身”可把我们疼坏了

马德清：当太监的头一步是“净身”。这件事，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并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苦寒人，只要想起伤心的事儿，心里就像挨针扎一样难受啊！（讲到这里，马德清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记得那是我9岁的那一年，大概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是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晕过去多少次。请想一想，那年头没什么麻药，没有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来，一根根神经都通着心，疼得心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动完这种手术之后，要在尿道上安一个管子。不然，肉芽儿长死了，撒不出尿来，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才听那些懂这种事的人讲，手术之后，不能让伤口很快结疤，要经过100天，让它偎脓长肉，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所谓药，不过是涂着白蜡、香油、花椒粉什么的棉纸儿。第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那时候，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整治我，母亲是妇道人家，在家里没有说活的份儿，她疼我，可是救不了我。就在我能爬起来，拖着两条腿走路的那些日子里，她就两眼一闭，永远地离开了我。